

## 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王远明 胡波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2-31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山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8—9日在中山市举行。来自澳大利亚、香港、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广州、中山、珠海等地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香山买办群体产生的过程和特点、代表人物、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社会评价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与会者认为，这是继今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之后，内地首次成功举办的香山买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它标志着近代中国买办研究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 一、新镜象——多维视角下的香山买办

鸦片战争后，香山买办不仅受到洋行及外国商人的高度重视和信任，而且也很快引起了封建官僚和洋务大臣的高度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外贸易范围的迅速扩大和晚清洋务运动的渐次展开，了解西方、熟悉洋务、半通夷语的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也因他们的大胆任事、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出色表现而倍受当时社会各界的称道和肯定。在当时一些热心洋务的官员的信札、函电和奏折里，都能看到“唐、徐声望素著，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之类对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的赞誉之词。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对买办商人的认识和评价逐渐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阶级斗争的浪潮所淹没，曾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大陆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买办商人形象，迅速被脸谱化和妖魔化，以致人们谈虎色变，对买办的历史讳莫如深。

改革开放后，国际化的视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缕春风。近代中国出现的买办阶级、买办制度和买办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其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影响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重新受到价值的考量和意义的阐释。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郝延平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和《近代中国的商业革命》两本论著，不仅推动了国内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而且也深化了人们对买办阶级的认识。汪熙、聂宝章、汪敬虞、张国辉、许涤新、吴承明、夏东元、陈旭麓等先生对买办、买办制度以及买办的经济活动和相关人物的研究，也为人们重新实事求是地认识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历史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特别是他们关于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香山买办的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买办阶级的认识，而且也奠定了香山买办研究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买办和买办阶级的认识依然存在着时代的局限，系统的研究和整体的评价同样存在认识上的片面和评价上的偏颇。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史学界对近代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过程研究的深入，多角度多层面的买办和香山买办的研究之花也次第开放。夏东元和易惠莉等对郑观应的深入研究，学界对轮船招商局的广泛探讨，城市史和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展开，以及商人、商业和商会史研究的持续推进，都为近代中国香山买办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2004年胡波在《史林》杂志发表了“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一文，对香山买办群体的形成，特点以及与上海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首次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2006年以来，又先后发表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兼论近代中外关系的几种研究模式》、《简述香山买办文化》、《孙中山与香山买办》、《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知行》等系列专题论文，出版了《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一书，真正拉开了香山买办群体研究的序幕。今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与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买办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首次在香港邀请了内地和澳门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买办与近代中国”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会后集结出版了《买办与近代中国》一书，有力地推动了香山买办研究。而这次研讨会，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的关于买办与香山买办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形成、发展、演变、特点、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并从整体上对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各种表现进行了历史还原和理论透视。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杰研究员认为香山买办乃是因中西文化最早碰撞而衍生的“土特产”。作为第一批敢于吃螃蟹者，在谋生与从商的探索中，“自觉”兼容外来文化，无形升华本土文化，并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升华自己——从“经济买办”步入“文化买办”层次，承担起史无前例的引导与表率作用。并指出香山买办的“先觉”，表现在他们开风气之先。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从中西贸易的实践中体悟了“工业化”的真谛，内化了“商战”的理念，因而成为清末民初“工商立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暨南大学张晓晖教授则认为在近代香山买办企业家群体身上，突出显现了传统中国所缺乏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具有相当优良的业务素质，依靠企业创新，进行高效经营，故能畅游商海，不惧强大的竞争对手，如表面上看起来，土得掉渣的郑伯昭却赢了从教会学校毕业、西装笔挺、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买办同行郭挺生。由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主持经营轮船招商局，不仅扭亏为赢，还与庞大的英美商轮船公司相抗衡，逼使英商怡和、太古洋行妥协，签订齐价合同，甚至还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创造了中国近代企业经营史上的一个个经典的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虞和平研究员从生成条件、产生时代、扩展方式、历史作用等方面，对香山买办与宁波买办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香山买办和宁波买办产生发展于不同的时间和时代，采用不同的扩展方式和途径，他们的历史作用也有所不同。香山买办以其最先产生和发展，而首创了中国近代的买办制度，可谓开通商风气之先；又因其赶上了洋务运动而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中发挥了沟通官商关系的重要作用，可谓培早期工业化之基；还因其较早受西方文化影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可谓领思想启蒙之潮。宁波买办由于产生发展较晚，没有赶上香山买办所领略过的时代，因而也不可能发挥香山买办所发挥过的作用，但是也起到了香山买办所没有起到的作用。其后来居上而拓展了中外通商渠道；又因其自身投资和经营的行业和企业较广、较多而更多地促进了中国民族经济的成长。因此他认为，在近代中国，香山买办和宁波买办各领风骚几十年，各显特色于世间，整合起来共同构成中国近代买办的历史。

这次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对买办、香山买办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本体论式的历史考察，使人们对买办香山买办的历史渊源、群体构成、网络建构、经营状况、社会活动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认为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产生的买办，与战前之买办有较大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仍相当密切，“买办”一词直接为后世沿用，足见鸦片战争前中西交往影响之深远。19世纪上海等地买办很多是广东籍，亦足见五口通商前后买办在人脉关系上的继承性。通事作为一种组织，也许逐渐消失，不再能够扮演重要角色，但原来通事的职能，则在鸦片战争后由新式买办所继承。有些买办即由通事演变而来。在他看来，旧式买办和通事的职责都包括在新式买办的日常生活中，但后者的职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被大大加以扩展。西人对华贸易在较长的时期内仍需依靠通事、买办进行，有其内在的原因，其中不少因素在鸦片战争前后都同样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学强研究员则根据以往的香山买办研究成果和自己多年实地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对香山买办群体的构成，网络的构建，以及社会活动等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他认为，大量事实证明，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开放，由南向北，大量洋行北移，买办形成了一个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说，上海是广州、香港买办网络的延伸与拓展。而在这个网络构建中，香山买办居于核心或重要地位。从广东到上海，香山帮买办网络的构成，既有历史的延续，更有内在的关联，洋商、洋行已经逐渐习惯了香山一带人的生活习惯、办事风格，以及他们的广东英语，他

们的人际关系，香山也就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广泛的买办网络。他还指出随着近代上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发生重大变迁，这一时期的香山买办也不单是中外贸易的联络人、中介人，而渐次深入到其他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原先的外贸、航运领域，逐渐向金融、工业、商业等部门扩展，这些在20世纪前期香山买办的构成中就有清晰的反映。上海社会科学院张秀莉助理研究员则对近代上海香山买办的收入与财富进行了更加具体的统计分析，她认为香山买办的求富或创收的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他们既从买办职业中获得高额的报酬，但他们同时还在经营商号，进行房地产投资，附股外商企业，投资新式企业等多种活动中获得可观的收入，积累丰厚的财富，成为通商口岸城市社会中的新贵。她还特别指出，香山买办在与外商合作求富的过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的理财方式和观念，从而成为新式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和创办者，由此影响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和特点，成为近代上海社会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

香山买办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崛起，成为活跃在通商口岸城市社会中的一种新生力量，其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和艰难。华东师范大学易惠莉教授就根据徐润伯父徐钰亨两次为湘淮军捐纳和唐廷植案这两个事例的条分缕析，认为同治初年当洋务运动初兴之际，在对外交往条件及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的香山买办并无特殊表现。其时，内地社会对两广民间社会的偏见以及政府对以涉外贸易为职业的买办的疑忌，正因太平军运动而加剧，成为制约香山买办群体能量发挥的重大障碍。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从香山买办和轮船招商局的互动关系中发现，由1872年至1884年，招商局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剧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努力将官商合作的旧模式和新的合资企业制度熔为一体，结果失败了。招商局早期的成功，部分是李鸿章精明的政策和商董的积极进取和技巧所共同缔造的。然而，李氏在中国早期工业现代化中的个人角色，亦引申出国家政策及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难题。招商局在1885年后运势逆转，显示我们永不可忽视新式企业运作于其中的晚清政局。这个政府资助的公司实际上是生存在特定的政治架构之中。因此，它的盛衰有赖政治和经济的环境。香山买办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经营管理活动固然得到政府某些方面的保护，但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实际上仍然险恶和多变。尽管如此，香山买办依然逆水行舟，以其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在洋务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早期工业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坚。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胡波教授在阐述香山买办与世界博览会的关系时指出，香山买办作为条约口岸城市里迅速崛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一开始就具有世界眼光和竞争意识，自觉地将自己的事业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有意识地试图推动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挨打走向独立自主，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虽然长时期受到冷遇，但当人们回首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时，总是难以回避与香山买办这个特殊群体有关的那些历史创造和文化创新的历史。香山买办徐荣村是第一个与1851年首届世博会有过亲密接触并获得参展品大奖的中国人，郑观应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明确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思想家。如果说徐荣村与首届世博会结缘尚属个人行为，那么香山买办商人、实业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世博情，则是一种国家至上和民族本位的世界想象。徐荣村与世博会结缘，重在参与和营销，局限于自己经营的产品，属民间的个体的自发行为，而郑观应对中国举办世博会的期盼和肯定，则是中国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承办的一种民族自觉和国家想象。徐荣村借世博会上荣记湖丝荣获金银奖的机会，成功地实现了产品荣销，赢得了丰厚的利润，郑观应则希望通过参与或举办世博会来推动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达到“商战和富国强兵的目的”。世博会在郑观应这里因而成了中国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阶梯。暨南大学香山文化研究所裴艳也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为香山买办的桥梁纽带作用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说明。她认为香山买办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在与西方商人的商贸活动和自身商业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观和西学观。他们的西学观是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效其技艺，臻于富强”等西学思想的推进和展开，触及了文化革新中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次，代表了香山买办群体对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社会改良的独特思考。在这一群体中，郑观应的思想最为先进，他出人意料地提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并提出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香山买办不仅是社会改良的思想家，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其推进近代洋务运动，创办民族实业及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是其文化思想实践层面的展开，也决定了特定时期内中西文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王悦则认为香山买办文化作为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香山人开放意识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是中山人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持续利用的绿色资源，也为中山的创意经济提供了文化沃土。

## 二、新发现——历史语境下的香山买办

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过去香山买办研究的基础上有了不少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新人新事的发现和史实史料的整理与解读。长期以来，学术界谈到买办或香山买办时，总是少不了郑观应、唐廷枢、徐润、莫仕扬等著名的买办，较少涉及其他的买办人物，似乎除了他们这几位著名的人物外，香山买办群体中再也没有人和事可言。而且讲到香山买办时，也主要是依据一些人所共知的材料来论史。这次研讨会上，有多篇论文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史料核心的研究对象。

上海社科院宋钻友研究员介绍了香山买办陈炳谦其人其事。根据他的研究，陈炳谦是1920-30年代上海广东商人最主要的代表。他担任买办约50年之久，又是上海广东买办的著名代表。他的投资活动涉及房地产、实业、金融等，是清末民初最殷实的旅沪粤商。致富后，他热心同乡社会的慈善公益事业，多次捐助巨款，被人视为大慈善家。他担任广肇公所的董事多年，热心同乡公益，发起粤侨商业联合会，投资设立广东医院，利用群体的力量维护商帮的经济利益，在同乡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为人开通、包容、大度，为了弥合旅沪粤商1918年的分裂作出了特殊贡献。陈炳谦的一生，行走在商业、社会、政治之间，不同于一般的商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陈炳谦的发现和深入研究，显然丰富了人们对香山买办和买办文化特性的认识。

珠海市博物馆张建军研究馆员对香山买办盛世丰及其家族史事与遗存进行了详实的考辨，为我们解开了长期以来盛世丰其人其事的历史文化之谜。据张建军考证，盛世丰字仕贤，号恒山，香山南大涌人。曾任十三行通译，先后在福州、上海、武汉等地任琼记洋行买办，负责茶叶方面的贸易业务，是汉口茶叶公所创办人和领袖人物。盛世丰主动融入汉口商业社会中，凭借丰富的商业经历，诸多香山同乡的关照，以及官场上的一些关系，在汉口各界游刃有余，茶业经营方面规模越开越大，社会地位也很高。他在汉口还帮办汉关银号、土药税厘、设茶号、绸庄等，号称百万，财富积累很快。他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对读书绩学之士敬有加，无不厚赏，在汉口很有声望。难能可贵的是张建军先生还对盛世丰家族移居香山后的分布情况和宗族关系等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考证，理清了盛世丰家族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地解读了盛世丰家族在香山地区的文化遗存，弥补了长期对盛世家族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香山买办文化和香山移民社会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上海社会科学院王维江研究员认为晚清德语文献中亦有不少关于澳门和香山地区买办活动的记录，是研究香山买办产生、形成、转变、性质、特点等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人们了解为何鸦片战争后大批香山人成为五口通商口岸洋行的买办提供了线索和证据。中山大学赵立彬教授同样认为上个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地理系所作淇澳岛的地理考察报告，何大章撰写的《中山县湾仔乡土地理》、《中山县地理概要》、《澳门地理》中的相关内容，为从事民国时期中山社会经济史、中山—澳门经济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背景性的历史资料，也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探讨近代香山买办和买办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学强研究员对香山买办人物的考订和总体估计，以及张秀莉对香山买办收入的较为精确的统计，都在客观上深化了人们对香山买办群体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香山买办研究。

值得称道的是，有些学者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亦进行了细致的研读，并从中发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研读郑观应的著述和相关历史后，认为郑观应八十年的一生都处在转型时代。他是一个在事功发展路径、治学、修身等方面都相当成功的人，是一个对时代变动有敏锐感触的人，一个善于选择自己发展路程、适时调适自己行为方式的人，一个既善于读有字之书又善于读无字之书的人，一个由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大聪明人，一个难得的通人。他在《论近代通人郑观应》一文里指出，郑观应的人生发展路径是商儒兼业，在经商、读书、著述、赈灾诸方面均有不错的表现。在治学路径上选择了中西兼习，博古通今。他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从《易言》、《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后编》和《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可以看出他的传统学问的功底相当厚实。在修身路径上选择了儒道兼修。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这两大资源，相互补充，对许多人产生过影响。进而为儒，退而近道，是支撑许多官绅进退的文化资源。这两种文化资源在一般官绅那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发生作用的，仕途得意，则奋发进取，仕途失意，则归隐山林，但在郑观应身上，则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同时发生影响，直至老年。根据郑观应的人生实践和他对自己行事哲学的概述，他认为“郑观应确实是通人”。应该说将郑观应定位为“近代通人”，是熊月之先生的一大发现。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也从《郑观应集》中发现郑观应与著名侨商张弼士既是旧交，又是道侣，二人甚至远结金兰。他们既有公共

事务上的合作，又有私人间的活动往来，相互扶持，共同勉励，在晚清重大政治和经济及社会活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漆德红和黄健敏以《徐愚斋自叙年谱》为中心，对近代香山买办的乡、族观念进行了历史探析和现象描述。在解读《徐愚斋自叙年谱》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买办商人虽然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但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似乎更加深远。他们从徐润的家族，他与广肇公所以及与民族间的关系等方面充分揭示了买办商人徐润的传统性与民族观念，并推而论及近代香山买办群体的民族观念及其在变化中的传统性，从而为全面认识香山买办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历史作用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佐证。与此同时，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也从《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发现买办的家庭史及其特色，认为香山买办在晚清时代巨变中，不仅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走在前列，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领先一步。

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生教授以二十世纪香港商人李耀祥为研究对象，从李家在十九世纪末由香山移居香港的经过，追溯其在香港兴业致富的原因，并且以李耀祥为例，阐述了二十世纪中期香港企业、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了解香山买办商人在香港的活动及其特点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黄绍伦和郑宏泰两位教授则对香港欧亚混血买办的兴起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讨。他们认为买办与欧亚混血族群在香港被割让为英国殖民地后嫣然出现，绝对可以看作是东西贸易往来渐多，华洋种族接触日频，但社会空间却一时没人填补的印证。开埠后，由于香港逐渐取代澳门而为转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对充分掌握东西文化，通晓中英语言，并能游走于中港两地的人才自然极有需求。若果华人社会中储备了充足的精通双语人才，他们绝对更具竞争优势——无论是作为政治吸纳的对象，以家族乡里作为支援及担保的力量，或是充当居间调停中介人的角色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普罗华人仍沉醉于科举，对世界局势仍欠了解，对西学又颇为抗拒，因而甚少愿意将子弟送往西式学校就读，精通中英双语人才一度显得极为缺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遭到华洋社会排挤但却精通中英双语的欧亚混血儿，反而变得炙手可热，获得重用，并迅速填补了那个“结构性空间”。一句话，东方与西方在二十世纪中时的碰撞令香港由籍籍无名的小渔村逐渐发展成国际城市；因华洋种族接触交往频繁而诞生的混血族群则因懂得紧抓时代机遇而崭露头角，有些成为名闻中外的买办，有些成为政府官员，更多的则成为专业阶层，并无孔不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及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

浙江理工大学何邦武副教授对郑观应的宪政思想进行了学理上的评析，认为作为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郑观应，其宪法思想不能算作宪政意义上的宪法思想，其人自然与“宪政第一人”无缘。但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符合宪政在中国演进的内在逻辑理路，是中国宪政之路必要的逻辑起点。因此主张将其视为对宪政之门的叩问而非仅仅营造宪政之“场”，是可以成立的。

暨南大学香山文化研究所马至融教授认为，因澳门与香山的特殊关系，香山成了富有特色的“口岸之地”、“商贸之地”和“西化之地”。“口岸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国向西方世界打开的第一扇窗户；“商贸之地”使香山成了中国现代经济的策源地；“西化之地”使香山人在另样的文化中汲取了更新自强的力量。因澳门口岸的特殊性，使香山买办成为中国最早受西方影响的群体。香山地区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在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成了第一批和外国人走得最近的中国人。

这些从历史文献的解读出发和从历史的现场起步，重新审视或探索发现香山买办群体的历史成因和性质特点的论著，既丰富了香山买办研究的材料，又充实了香山买办研究的内容，既注重香山买办成长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构成的历史场域的宏观把握，又在细节上强化了香山买办的个性特征和精神品质，论从史出，客观公正地还香山买办以历史面貌，从而使本次学术研讨会精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

### 三、新亮点——解读通人郑观应

在这次研讨会上，话题最多的还是硕学买办郑观应。虽然人们对郑观应其人其言并不陌生，其《盛世危言》和“商战”思想似乎成了郑观应的代名词，但是严格说来，人们对郑观应其人其言其行其心还是缺乏透彻的了解。本次研讨会收到的35篇论文中，有10篇直接与郑观应有关，因而也成为研讨会上的热门话题。

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对郑观应进行了新的评述，首次提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难得的通人，认为如果将郑观应的人生事功发展路径、治学路径，修身路径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走极端，兼顾两端，商儒兼业，中西兼习，儒道兼修。这一结论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也为人们重新审视郑观应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崭新的理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着重分析了东西互保时期郑观应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认为在东南互保形成过程中，郑观应无疑是赞成东南经济发达地区暂时脱离中国政府的管制，与列强达成共管的协议，既可避免联军转舵南下，惊扰东南，也可防止义和团民众在联军和清军的驱赶下东西流窜。同时马勇还强调商人、洋行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并不是一般的商人，或许是因为其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机缘，使他和同时代的洋务人才、买办大班有着较大的区别。他寄身于买办阶层，但似乎并没有沉溺于灯红酒绿，贪婪于金钱财富，他忧国忧民时，不满于社会现实，不满于政治现状，他对西方近代富强之路，大国复兴的历史与根源有着充分的理解和研究，总是期待自己的祖国也能像西方大国一样，实现复兴，重建辉煌。因此认为郑观应具有那个时代少有的忧患意识和普世理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眼前的现象所迷惑，总是睁眼看世界。正是他对外界动态的密切观察和及时建言，才导致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互保事件的发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邵建以《盛世危言》和《漫游随录》为线索，对郑观应和王韬的铁路认识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郑观应更偏向从宏观的方面考虑铁路的种种有益之处，往往直接将中国铺设铁轨，通行火车与国家变法图强联系在一起，而王韬则更为注重从微观的甚至技术的角度分析铁路及火车，感觉上王韬对于铁路的认知似乎要比郑观应更加深刻。这种区别的原因显然与二人的经历差别大有关系。广东社会科学院王学进认为，郑观应的思想与活动对当时及后来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是对政府官员，尤其是改革派的影响，起着思想解放与指引的作用；二是对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的影响，起着思想启蒙作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申群喜和梁文生，对郑观应职业变化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认为郑观应从传统儒生到洋行买办到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变动，既增加了个人的经济资本，又提升了个人的文化资本，使总资本大幅度增加，从而逐渐提高了自己在社会空间的地位。他的这种职业的不断转换从侧面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的特殊性。珠海市博物馆李世源则认为郑观应的经历是一个缩影，道出了广东香山籍人物在洋务运动史上的杰出表现。《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成了一个在传统文化接受和外来文化转换成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过程的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整整几代人。也透露了郑观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心路历程。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长期以来倍受关注，这次研讨会上同样受到重视。武汉大学历史学萧致治教授则认为郑观应商战思想的产生，与他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强调对其“商战”思想不宜做狭隘的理解，而应从振兴中国经济、富国强兵的大宏图上去评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周溯源研究员对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切中了晚清的时局和国情，从商业层面进一步丰富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内涵。郑观应积极主张壮大民族产业、发展民族商业，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情怀值得令人认真学习。而且，“商战论”对数千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轻商”思想发起冲击，为近代中国商业发展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总之，他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探索方向，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

另外，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楚向红对香山买办与广肇公所的重建方面的历史钩沉，李宁对《英语集全》的内容分析，以及李世源对香山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唐廷植的总体评价特别是《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主编江中孝和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陈国庆分别对买办和香山买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都为香山买办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资料的参考。

总之，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会，虽然短暂紧凑，但论题广泛，论点新颖，开国内香山买办研究专题研讨会之先河，使香山买办研究初步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深层，从主观到客观的历史性跨越，也使香山买办的评价从反面走向正面，从全盘否定走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为中国近代买办阶级和香山买办群体的历史研究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新风。

文章录入：mayong 责任编辑：huangcs

- 上一篇文章： 《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目录提要
- 下一篇文章： 吴敏超：近代史所第三次青年读书会活动综述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纪念中俄建交六十周年，加
-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
-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
-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
- “新史料与民国史研究”研讨
- 闻黎明：在“知识分子与近现
-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
-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